

● 林青山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风云十年与 邓小平



风云十年与邓小平

林青山著

解放军出版社

1989·北京

D652/8

风云十年与邓小平

林青山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风云十年与邓小平

林青山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5.3 印张 305 千字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5-1061-8/1·149

定 价: 5.90 元

社编号 04-0021

楔 子

写这本书的初衷，本来只想如实地记述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故事。可是，水有源，事有因，一位重要人物的事迹，决不会孤立地出现于天地间，一场重大历史变故的发生，也不可能偶成于一朝一夕。如果不交待历史背景，不理清来龙去脉，读者就会堕入“云里雾中”：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延续十年之久、殃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那么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不能有效抵制和制止这场灾难？为什么邓小平会成为这场运动要打倒的主要对象？他又是怎样被打倒的？……为此，作者不得不先把镜头拉回到过去的年代，准确地说，即回到作为“文革”酝酿期的五十年代末。并且，作者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笔墨，去揭露“文革”中那些鲜为人知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背景，特别是幕后活动中的人和事。

这样写来，可能会显得喧宾夺主，节外生枝，但愿精明的读者，能从中看出内在的联系，得到更多的启示。

目 录

楔子

第1章	“文革”前奏曲	(1)
第2章	秘使南行	(29)
第3章	突然袭击	(75)
第4章	在困境中抗争	(113)
第5章	摊牌	(143)
第6章	身陷重围	(158)
第7章	被凌辱的岁月	(184)
第8章	流放	(208)
第9章	逆境点滴	(235)
第10章	启用	(254)
第11章	告别江西	(274)
第12章	恶人告“御状”	(288)
第13章	江青“倒阁”	(315)
第14章	“太岁头上动土”	(333)
第15章	苦撑危局	(360)
第16章	“四·五”风云	(387)
第17章	窃国者的下场	(430)
第18章	众望所归	(469)

后记

(487)

第一章 “文革”前奏曲

1958年，我们犯了“急过渡”、“穷过渡”的错误，想一步跨入人类的“天堂”——共产主义。这年8月，天热，人的脑子更热，有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苦战三个月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好赶浪头的陈伯达也不甘寂寞，提出了“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的建议。

8月17日，在风景如画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议决定钢翻一番，生产1070万吨。并宣布过渡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主张实行供给制。为了推行这种空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又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一位数，积累率猛增到33.9%，职工人数也增加几千万；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结果到嘴的粮食，收不上来，埋在雪里，扔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加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运动，“一平三调”的共产风，雪上加霜，弄得元气大伤。

昙花一现的穷共产主义运动，转眼之间露馅了。精食不够吃，农民开始逃荒要饭了。大炼钢铁运动，

许多地方炼出来的非钢非铁，而是一堆堆烧结的矿渣，荡尽资源和人力，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社会上不但没有增加财富，反而造成大破坏……

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这段话说得十分恳切，十分明白。第一，邓小平并没有把1958年的错误全部推在毛主席一个人身上，承认自己当年也头脑发热。据此可以看出，至少在1958年期间，他们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邓小平指出，大跃进的主要责任是毛泽东的，毛虽然最先发现并承认了错误，有改正错误的愿望，但由于总结教训不够，后来并没有改正错误，终于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与如何对待1958年的错误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事实正是如此。

本来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只有两条路：一是悬崖勒马，改变决策；一是顺流而下，继续蛮干。

但当时的上层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仍然缺乏危机感，没有看出里面潜伏着爆炸性的危险因素。这年10月还提出1959年工业生产的中心任务，要“为完成2000万吨钢而奋斗”。

这年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开始觉察到了有“左”的错误，也采取了些补救措施，提出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但仅靠小改小补已无济于事了。

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浮肿、挨饿、逃荒，死亡的悲剧到处都在发生。

到了1959年夏，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陷入了濒临崩溃的危机。

这年的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原定议题是纠正“左”的错误。但毛泽东对当时严重的形势仍然估计不足，他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认为缺点只是一个指头，成绩是9个指头。

7月14日，风和日丽、风景如画的庐山，更令人心旷神怡，但一件爆炸性的消息，却使与会者目瞪口呆。

事情是这样的：性格耿直、体恤民情的彭德怀，根据自己在民间了解的情况，发现“左”的错误已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不顾个人得失安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跃进中发生‘左’的错误的根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毛泽东发火了。几天之后，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

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要硬。”在讲到自己的责任时他说：“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但是……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是我建议的，我下决心，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

敲鼓听音，讲话听声。这里的检讨是带着情绪的。进城以来，毛泽东逐渐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了，他常常过于自信，习惯于个人说了算，虽然有了错误，他自己会很快地发现，并且认真改正，但他不喜欢别人指出，来纠正，谁这样做，谁就有“篡党夺权”的嫌疑。这是他的精明处，也是他的可悲处。他后来走向极端，不能不说这是个重要原因。

会议越开越升级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顷刻之间，彭德怀便身陷重围，不分昼夜地受到围攻和指责。本来应该反“左”的错误，现在又反起“右”来，而且火上加油，“左”上加“左”了。

后来，毛泽东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近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从此，人们的嘴被封住了，谁敢说“三面红旗”

一个不字，谁就是“与敌人里应外合，猖狂向党进攻”。一顶大帽子在那里等着呢。

“左”的错误不仅没有煞车，而且更加开足了马力。经过蛮干，这年底，钢达到了1387万吨，可积累率却高达43.8%。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年，即1960年，还规定钢要搞2000万吨。人们看到，工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死神在叩着不少人的家门，对“左”的政策怨声载道。可是不久，全国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成千上万人被饿死的严峻形势面前，1960年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这几年“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情绪，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提出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

这个时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分管书记处，主要抓党务工作。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他把精力转过来，协助站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抓农业，纠正“左”的错误。在他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恢复农业生产，确实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邓小平开始意识到“三面红旗”并不是富国利民的决策，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它是行不通的一种空想。不根据经济规律制定经济计划，而只凭主观意志，脑子发热来作决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毛泽东还在号召党的高级领导人学《张鲁传》。张鲁即三国时代

汉中的一个农民领袖，他创办了“五斗米教”，主张把农民打的粮食一概收上来，再平均分配。实际上这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毛泽东很欣赏张鲁的这一套。他认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并曾说过：关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时间，要和苏联“对表”，“苏联是老大哥，让他一下，他上午挂共产主义的牌子，我们下午挂共产主义牌子”。

邓小平对于这一切，头脑比较清醒。他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主张允许农民有百分之五的自留地，允许让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允许搞家庭副业，偏僻地方，还允许个人养牛马等大牲畜。这无疑是在向神圣不可侵犯的“三面红旗”杀了个回马枪。据后来毛泽东自己说，就是从这时起，他对邓小平开始不满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年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汇报会上甚至这样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都不找我。59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另一次，毛泽东又说：“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他就抓彭真。……李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情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其实，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已自动退居第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邓小平有事不象过去那样直接向他汇报请示，原是合乎常规的，并不

存在什么“敬而远之”的问题。归根结底，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日渐疏远，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对待 58 年及其以后“左”的错误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当然，邓小平严格务实，不说空话，善于独立思考，颇有主见，而又宁服膺真理不屈从于权威的性格与毛泽东日益暴露的家长制作风的冲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事实确实如此。

1959 年之后，邓小平在主持书记处工作时，就有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消除“左”的错误。

到了 1960 年，“三面红旗”造下的恶果，已使邓小平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因此，他协助刘少奇采取了灵活的补救办法，在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当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佳方案。

1962 年，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说：“现在农业问题，要从生产关系上来解决，现在全国有公社所有制，大队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还有安徽的责任制，实际上是分田到户，不合法。哪种形式能比较容易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用哪种就用哪种，使不合法的变成合法。”他又说：“相当多的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农民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公开地向“左”的政策进行如此抨击，说出了亿万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这要有多大的勇气啊！

邓小平不仅在口头上讲，而且付诸实施。一天，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其他领导人到北京开会，休会时，他们去邓小平家里做客，寒暄之后，邓小平毫不含糊地向李井泉道出了自己考虑很久的打算：“你们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如何？据说包产到户可以更快地恢复农业。”李井泉等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们回到西南局之后，便按照邓小平的意图行动起来了。

对于当时“左”的错误问题，邓小平和刘少奇、邓子恢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深深感到农村经济受到“左”的错误的冲击，已经伤筋动骨了，要想恢复农村经济，决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动大手术，才能起死回生。

早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曾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国农业情况好转不是三年五年的事，而是七年八年的事。”他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生产关系很紧张。三年来所有制破坏了，积极性破坏了。天灾不是主要，人祸是主要的。”这等于把锋利的匕首，直接刺向“三面红旗”。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样唱反调，自然是极为反感的。难怪六年之后，1967年10月，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加给邓小平“十大罪状”时，大喊大叫：“1962年，邓小平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的面前，里应外合，竟然提出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主张，带头刮起了‘单干风’，说什么‘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其实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只要能增产，就是单干也好。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

邓小平非常清楚，农村中的问题，说穿了，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脱节的问题，落后的生产力，怎能一步登天，一下跨入共产主义。盲目贪求“两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势必导致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给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力，以沉重的打击。18年后的1980年，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还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

1962年1月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怎样渡过困难时期。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报告，在分析什么会造成三年困难局面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人祸是主要的，天灾是次要的，公社化搞早了……”会议讨论时，来自各省、地、县的领导干部，也都异口同声地批判“左”的错误。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当时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毛泽东却认为这次大会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由于形势所迫，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大会上检讨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责任；第二笔帐，是省委、自治区党委的，

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

在这次大会上，只有一个人投毛泽东之所好，对这几年“左”的错误，他不但只字不提，反而粉饰太平，大唱赞歌。这个人就是林彪。他在大会上离题万里，不负责任的发言，使与会者顿时哗然。

林彪没忘记“走捷径”这条登龙术。他看准了火候，即下赌注，趁机捞上一把。

这天，林彪慷慨激昂地把“个人崇拜”那一套搬了出来，他在发言中总结“大跃进”以来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说：现在的困难，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接着，他又大肆兜售“造神论”说：“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实际，不脱离实际。”他把工作“左”的错误，一古脑儿推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奉承讨好地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林彪的这番话，并不是冲口而出，而是经过老谋深算的。他的话，象一股冷风袭击着整个会场。这同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在认真总结失误的教训的气氛，很不协调。其言外之意，就是说，造成“左”的错误的

根本原因，主要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那么，错误自然应该由这些常委负责了。事情是明摆着的，他是一箭双雕：一则嫁祸于其他中央常委，二则挑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他的用意在于向毛泽东邀功取宠，使毛主席相信，在处境困难的时候，只有林彪是最忠于自己的。在林彪的心目中，泰山塌了顶，黄河决了口，千万人挨饿、受难等等，好象都与他无关。他这个常委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到时候横挑鼻子竖挑眼就行了。他终日盘算的头等大事，便是怎样攀登权力的最高峰。

这次会议对毛泽东震动很大。使他意外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居然敢于当着自己的面指责“左”的错误，提出那么多的意见。他似乎感到长期和自己在一起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也不怎么亲密了，省、地、县等各路诸侯也有了离心倾向。在这关键的时刻，只有林彪，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自己。也许就在这时，他打定了要进行“全面反击”的主意。

大会的文件向下传达后，人们看到党中央勇敢地承认失误，并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无不感到有了希望，精神为之振奋，充满战胜困难的信心。谁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却又潜藏着一道可怕的、威胁着中华民族的阴影。这一点就连具有远见卓识、非常老练的政治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当时也没有料到。只是事件发生之后，回过头一看，才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